

Fictions du pouvoir chinois



SEBASTIAN VEG



在虚构与现实之间

20世纪初期的文学、
现代主义和民主

Littérature, modernisme et
démocratie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法] 魏简 著

杨彩杰 杜卿 包世一 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SEBASTIAN VEG



Fictions
du
pouvoir chinois

在虚构与现实之间

20世纪初期的文学、
现代主义和民主

Littérature, modernisme et
démocratie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法〕魏简 著

杨彩杰 杜卿 包世一 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虚构与现实之间: 20 世纪初期的文学、现代主义
和民主 / (法) 魏简著; 杨彩杰, 杜卿, 包世一译.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115-5666-0

I . ①在… II . ①魏… ②杨… ③杜… ④包… III .
①世界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 ①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4977 号

Fiction du pouvoir chinois. Littérature, modernisme et démocratie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
By Sebastian Veg
Copyright © 2009,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9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People's Dail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18-3068 号

书 名: 在虚构与现实之间: 20 世纪初期的文学、现代主义和民主
作 者: [法] 魏简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蒋菊平 刘天骥
特约编辑: 张嘉宁 李 姗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09 65369527 65369846 65363528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511
网 址: www.peopledailynew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960mm × 1300mm 1/32
字 数: 393 千字
印 张: 13.875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5666-0
定 价: 85.00 元



一、《新青年》，1918年5月号
(此期刊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

二、鲁迅《阿Q正传》的封面，
由丰子恺所绘（1939年）



三、北京的学生游行(1918年11月14日)

Franz Kafka:

Eine kaiserliche Botschaft.

Aus dem in nächster Zeit erscheinenden
Buch: „Ein Landarzt. Kleine Erzählungen.“

Der Kaiser — so heißt es — hat Dir, dem Einzelnen, dem jämmerlichen Untertanen, dem winzig vor der kaiserlichen Sonne in die fernste Ferne geschickten Schatten, gerade Dir hat der Kaiser von seinem Sterbebett aus eine Botschaft gesendet. Den Boten hat er beim Bett niederknien lassen und ihm die Botschaft ins Ohr zugeflüstert; so sehr war ihm an ihr gelegen, daß er sich sie noch ins Ohr wiederzagen ließ. Durch Kopfnicken hat er die Richtigkeit des Gesagten bestätigt. Und vor der ganzen Zuckerschmelze seines Todes — alle hindernden Wände werden niedergebroschen und auf den weit und hoch sich schwingenden Freitreppen stehen im Ring die Großen des Reichs — vor allen diesen hat er den Boten abgefertigt. Der Bote hat sich gleich auf den Weg gemacht; ein kräftiger, ein unermüdlicher Mann; einmal diesen, einmal den andern Arm vorstreckend schafft er sich Bahn durch die Menge; findet er Widerstand, zeigt er auf die Brust, wo das Zeichen der Sonne ist; er kommt auch leicht vorwärts, wie kein anderer. Wer die Menge ist so groß; ihre Wohnstätten nehmen kein Ende. Oeffnete sich freies Feld, wie würde er fliegen und bald wohl hörtest Du das herrliche Schlagen seiner Fäuste an Deiner Tür. Aber statt dessen, wie nutzlos müht er sich ab; immer noch zwingt er sich durch die Gemäuer des innersten Palastes; niemals wird er sie überwinden; und gelänge ihm dies,

nichts wäre gewonnen; die Treppen hinab müßte er sich kämpfen; und gelänge ihm dies, nichts wäre gewonnen; die Höfe wären zu durchmessen; und nach den Höfen der zweite umschließende Palast; und wieder Treppen und Höfe; und wieder ein Palast; und so weiter durch Jahrtausende; und stürzte er endlich aus dem äußersten Tor — aber niemals, niemals kann es geschehen — liegt erst die Kaiserstadt vor ihm, die Mitte der Welt, hochgeschüttet voll ihres Bodensatzes. Niemand bringt hier durch und gar mit der Botschaft eines Toten. — Du aber sitzt an Deinem Fenster und enträunst sie Dir, wenn der Abend kommt.

Oskar Roehn:

Der Uebergang.

Ein fernlenloser Himmel liegt
über der roten Flut.
Geht durch Finkernisse steigt
kein Atem und kein Blut.

Wieder geht Gott durchs Paradies.
„Wo bist du?“, ruft er mild
und du erkennst, was er verhieß,
dich als sein Ebenbi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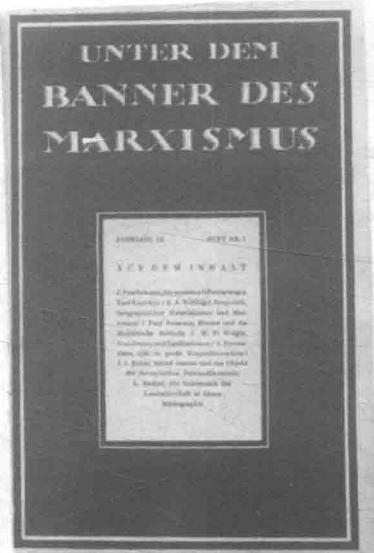
Der Auf krank angeschäm; du brennst
sein Angesicht zu sehen —
und spürst nicht, daß du Welken trennst,
die wie zwei Banern stehen.

Im Osten steigen Licht und Lied.
Der Lebensbaum in Abend Glut
blüht wieder. Jeder Antoschisch
von Mensch zu Gott wird abgetan.

四、弗兰茨·卡夫卡的《一道圣旨》(《自辩》,1919年9月24日)



五、《孙中山：一个中国革命家的记录》
(1927年,布莱希特的藏本)



六、《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
其中一期,内含魏特夫的文章



七、从左至右：老舍和曹禺（1946年）



八、从左至右：胡风 and 老舍（1950年）

目录 | CONTENTS

引言	001
一、文学与政治	001
二、民主的祛魅	002
三、异域情调和文化主义	006
四、虚构能说什么?	010
五、虚构和民主	014
 第一章 文学和中国：帝国、民族国家和殖民主义	018
一、一种民族文学的诞生? ——卡夫卡和鲁迅	021
二、游记和殖民主义：谢阁兰对洛蒂?	045
三、在社会现实主义和中国民俗之间：布莱希特的政治 剧场和老舍	053
 第二章 历史问题：无迹可寻的革命与一成不变的权力关系	072
一、辛亥革命：一场非事件(谢阁兰、鲁迅)	074
二、卡夫卡笔下的中国：从皇帝到领导层	099
三、重复还是进步? 面向历史的戏剧(布莱希特和老舍)	115
 第三章 虚构与规范	141
一、虚构与道德：对虚构的道德谱系的批评	142
二、污浊的法庭	165
三、从法庭到不可知的法律：卡夫卡和对哈西德故事的 戏仿	182

第四章 虚构,另一种声音? 虚构和权力机制	196
一、从个体解放到集体行动(布莱希特)	198
二、阿 Q 的呐喊,叙述者和农村世界的声音	211
三、老舍和被历史掩盖了的声音	226
四、寻找不到的相异性:以多异(le divers)替代神圣(le divin) (谢阁兰)	233
第五章 虚构,民主的语用性行为	251
一、现代性的政治含义	251
二、卡夫卡:两难的政治	263
三、小说的权威(《勒内·莱斯》)	279
四、阅读的公共空间	292
五、公共空间的嵌套(老舍)	319
总结	328
一、阅读	328
二、民主的虚构	330
三、现代性和“中国式的现代性”	333
四、虚构	334
五、民主	336
附录	340
参考书目	351
人名与作品索引	395
主题索引	423
插图注释	432
致谢	434

引言

一、文学与政治

在每一个时代,文学和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似乎都会被重新提起(但不必然以新的方式被提起),它为大学研究者或评论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和思考源泉。他们往往急于展示自己终于摆脱了前人所遇到的难题和所做的妥协。因此,我们今天或多或少地目睹了,自欧洲共产主义衰落后,人们对文学与伦理、政治间的关系产生了新的兴趣。在此之前,文学和伦理、政治之关系只考虑到“文艺的介入性”(l'engagement)这个面向;但在此之后,“文艺的介入性”就下降到了历史古董的地位。然而,如果现行的研究仍敢于在这一领域“画蛇添足”的话,那么这一“足”所做的便是完全略去此面向,并竭力把自己与现时的两种主流理论——“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和结构主义——的范式区分开来。“文化研究”的范式倾向于把虚构(la fiction)化约成众多社会话语中的一个;而在结构主义的派系中,虚构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则再度建立于“审美自主”(l'autonomie de l'esthétique)的概念上。(9)

在本书中,文学和权力的关系将以更广阔也更明确的方式展开。更广阔,是因为通过把探问延展至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任一特定国家或欧洲的某些或然地存在的特征将会变得相对起来;更明确,是因为把研究缩小至虚构文学(la littérature de fiction)的层面上。而虚构文学在其与权力的关系中,展现出鲜明的特征。潜藏背后的假设是,出于虚构和权力两者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运用语言,两者之间其实是一种历史的亲属关系,甚至是一个互相交缠的谱系。事实上,虚构只有在它引起了读者的信任这个条件下才能发生作用;另一方面,传统权力部分地倚赖“主导虚构”(master fictions)的概念,就如克利弗德·格尔茨

(10) (Clifford Geertz, 1926—2006)所言,“主导虚构”把一种叙述或再现形式,置于政治秩序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心位置,促使各个主体信任这个权力。在历史层面,传统的虚构以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如国家理性,或含教化作用的道德主义的面貌出现,因而时常显示出它与权力之间一种谱系式的亲属关系。

相反,在现代某些作家曾透过虚构产生的信任感这个特殊的本质,引起对意识形态或道德规范的质疑,从而打破虚构与权力的交错关系。应否把这个特殊本质视为现代性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呢?虽然个别作品自古代伊始便带有这种特征。事实上,其背后的假设是在针对虚构的人类学层面发问:虚构之所以会和政治秩序的中心谱系化地联系在一起,是否是因为虚构为了起效,必须产生信任感?这种情况下,不少现代小说(也有一些前现代小说)正与虚构这个文类的原始状态恰恰相反。或者,虚构作为一种文类,它是否透过一个在历史长河里总体来说从未改变的双重约束(double-bind)来做界定呢?这个双重约束因为虚构的信任感(la croyance fictionnelle)本身带有的双重性,既把虚构与权力连在一起,又把虚构与对权力的反抗连在一起。事实上,这个双重性表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即使读者被邀请进入一个虚构的世界,并自愿终止怀疑(will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这个世界仍然彰显出鲜明的虚构性。然而,正是由于这种虚构性,文学才可以开启质疑世界的可能性。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此书把虚构视为一个穿越时间和空间的、人类学的现实,同时分析它在一个确切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的状态和功能。此书希望,调解两种进路——虚构的人类学背景这种进路,和把虚构视为语言交际性行为多于视为简单的现实反映,并对之进行社会历史学分析这种进路——的尝试,可以转移文学和权力的讨论,同时厘清人文学科内部关于文学研究的状态的论争。

二、民主的祛魅

因此,权力和虚构的关系这个问题,将由一些探讨权力的虚构作品开始,即由20世纪初期,清末民初之际一些关于中国权力架构的虚

构作品开始。较之一个寻找文化特征的既定成见,这个选择首先展现出丰富的时间和空间的布局,其目的是为了理解一个普遍的问题:传统权力面对众多现代民主政治形式出现时,两者之间的角力是怎样的?这是一场通常会过快地用“西化”一词以蔽之的演变。在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①之间,中国出现了(11)对传统政治形式的深刻怀疑,同时也出现了现代制度的批评反思——在这两种情况中,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的政治形式,反思的对象既指向中国也指向西方。这场历史演变引起了中国和欧洲作家的注意,它同时也代表了一个反思民主诉求与文学、美学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的最佳时刻。

因此,我们在那些涉及对两种情况进行思考——中国现代政治形式的出现和文学在这种现代性里的位置——的作品中,选择了五部作品。其中两部今天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鲁迅(1881—1936)的《阿Q正传》(1921)和老舍(1899—1966)的《茶馆》(1956)。对应这两部作品,我们采用了三部欧洲作品: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 1878—1919)的《勒内·莱斯》(*René Leys*, 谢阁兰于1916年完成,但此书1922年于其死后才出版),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著名的短篇小说集《中国长城》(*La Muraille de Chine*)^②,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的《四川好人》(*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 1943)。虽然其他选择标准毫无疑问也是可行的,但我们把研究文本局限于这些中国语境的作品,是考虑到鲜有欧洲文本描写欧洲

① 1919年5月4日,一场学生游行在北京爆发,抗议中国代表团接受《凡尔赛条约》的条款,任由德国把山东转让给日本。游行中有赞颂“赛先生”与“德先生”的标语与口号,它们象征了这场为新中国揭竿而起的运动。新文化运动的萌芽出现在1915年,这是《新青年》杂志创刊的时间。

② 《中国长城》一般是指五篇短篇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Beim Bau der chinesischen Mauer*, 1917)、《往事一页》(*Ein altes Blatt*, 1917)、《关于法律的问题》(*Zur Frage der Gesetze*, 1920)、《拒绝》(*Die Abweisung*, 1920)和《征兵》(*Die Truppenaushebung*, 1920)。(本文正文及注释中,涉及外语作品引文的翻译及翻译出处时,如有通行中文译本者,本文会引用通行翻译及列出通行翻译的出处,如没有列出通行翻译出处的引文,则由译者所译。——译者注)

的政治转变^①，中国因而毋庸置疑地成为一个上演现代性政治剧变的最佳场所。因着中华帝国悠久的传统和特色，它和俄罗斯一样，是一个创造新的政治形式的实验室，甚至比俄罗斯更甚。在这个实验室里，无论在欧洲作家还是在五四运动的作家看来，新的政治形式必须建立在一系列旧权力的再现或形象上^②；建立在陈旧过时的、全体性的、宗教性的、官僚的、地方的、施行于个体身上的权力政体的形象上。

较之相互的影响^③，一个由共同的批评资源组成的背景才是这本

① 事实上，在20世纪初期的作家中[布莱希特、卡夫卡、塞利纳(Céline)]，美洲或殖民地世界的迂回故事似乎是反思欧洲民主的优先场所。这和缪塞(Musset)的时代，甚至于莫泊桑(Maupassant)的时代不同，如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一次政变》("Un coup d'Etat")就涉及第二帝国在一个诺曼底村庄里的衰落过程。莫泊桑著：《短篇小说》(Contes et nouvelles)，第一卷，第1004—1014页。中文翻译请参见赫运、赵少侯译：《一次政变》，《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71—282页。又如缪塞以第一帝国衰落时期为主题：“当时青年人的生活中包括三个因素：在他们的后面是一个永远摧毁了的过去，可是许多世纪以来专制政体的一切陈腐的东西，还在它的废墟上蠢动；在他们的前面是黎明中的一个广大的前景，未来的最初的光明；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有一种好像是海洋一样的东西，把旧大陆和年轻的美洲分隔开来。”缪塞著：《一个世纪儿的忏悔》(La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第24页。中文翻译请参见梁均译：《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6—7页。我们在波德莱尔以1851年政变后的事物为主题的作品——《我心赤裸》(Mon cœur mis à nu)里，找到类似的表达方式。在注释中以缩写方式列举出来的作品，其完整书目细节会放在书的最后。为了阐述一个次要的观点而只引用过一次的作品，不会列在参考书目中，完整的参考出处只会在注释里出现。

② 从“再现”这个层面来说，我们可以留意到在某些俄罗斯作品里，权力并没有如同在中国作品里一样，拥有神圣的光环。反之，权力被简化为一个盲目而荒谬的官僚主义，如果戈里的作品；或者，权力化作为一个充满罪恶的专横帝国，如鲍里斯·戈东诺夫(Boris Godounov)或普希金笔下的人物。相反，毕来德(Jean François Billeter)透过描述在周朝(公元前12世纪)，中国权力的一个特别结构，就是权力建基于祖先崇拜这个“整全的社会现实”上，从而提出以下假设：“上层领域，即‘普遍’，和乡土领域，即‘个别’，这二分法中，前者永远垄断了所有象征性地触及权力的东西。”让·普瓦里埃(Jean Poirier)编：《中国文明。简介：中国的世界》("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Introduction; l'univers chinois")，《礼仪史第三卷：文化主题和文化系统》(Histoire des mœurs, III: Thèmes et systèmes culturels)，第865—931页。然而，我们不应因而限定了“中国权力”这个概念。它对我们来说，从来都是一个历史建构，而不是一个文化本质。

③ 卡夫卡大概从没看过《勒内·莱斯》，但他的布拉格同乡里尔克写信给芭拉黛娜·克洛索夫斯卡(Baladine Klossowska)时则说：“为了让你看几页谢阁兰，我把拉鲁那本给你再寄一遍。至于勒内·莱斯，虽然他现实上不存在，但某些内在的谨慎禁止我去思考，思考他是否真的可以如此生活。就是这点令这本书的秘密如此奇妙，它迫使你在面对自己之时，对你在书里看到的或知道的事情保持沉默。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这本书里没有女性；那些美丽的、在前门外遇上的伴侣，不比花儿在书里占的位置更重要。而大内的那位女性，尽管我们知道所有关于她的事，但仍格外地难以接近；竖立一道墙，这是容易的。但要我们相信墙背后有半人半神的存在，并只谈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爱和不辛，这就是惊人的了。”1924年2月15日的信，收于勒内·马利亚·里尔克著，迪特尔·巴塞曼(Dieter Bassermann)编：《勒内·马利亚·里尔克和默林：书信，1920—1926》(Rainer Maria Rilke et Mertine. Correspondance, 1920—1926)，苏黎世：Max Niehans出版社，1954年，第502—503页。

书的研究对象。这个批评资源来自知识危机三部曲,由对查尔斯·达尔文、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作品之接受表现出来。虽然在20世纪初期,中国作家所要求的改变在中国传统里也找到了呼应,但是对国外理论的翻译和改编,以及借鉴欧洲经验而得来的知识,仍然为这些横跨整个中国的改变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契机。^① 故此,必须与那些受了这三个现代性的批判理论^②所影响的欧洲文本做比较,反之亦然。因为,为了确定它们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欧洲“异域情调”的幻想,这几部作品必须面对中国的历史。最后,除了局部比较外,这五个文本集合在一起,既对新政治形式的合理性做出普遍地探询,又记下了中国在“帝国终结”和“民主化”历史潮流中的情况。(13)

“现代”政治形式的植根的问题,贯穿了整整一代的作家(在中国如是,在欧洲也如是)。现代政治形式关心“状态的平等”(l'“égalité des conditions”),托克维尔(Tocqueville)就是首先使用“状态的平等”去定义民主内涵的人。适逢“帝国终结”——中国在1912年,俄国在1917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在1918年,奥斯曼帝国在1922年——中国的土壤首先提供了思考现代国家植根的可能性的契机。换言之,受欧洲民主

① 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的研究低估了某些中国传统批评思想家的重要性,也低估了清末、清末的政治实践和20世纪初暴力地实施现代化,两者之间的连续性。但今天,相反地,我们也必须避免否认西方对五四现代化推行者的影响。这篇论文的目的,恰好是要提供一个更仔细的、关于在这个历史进程里知识分子相互影响的解读。也参见柯文(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② 严格来说,达尔文的著作不是一个“现代性的批判理论”。但达尔文主义是以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 1825—1895)的书《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1893)作为中介,从而传入中国的。这本书由著名的翻译家严复于1896年翻译和改编成中文,以“天演论”为题。见史景迁(Jonathan Spence):《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第301页。中文翻译请参见黄纯艳译:《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第278页。当赫胥黎反对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把达尔文理论套用在人类社会的同时,在中国,因为严复对赫胥黎的文本做了一种民族主义的诠释,达尔文主义反而被理解为一个用作解释被现代化激化了的民族之间矛盾的理论。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写道:“严复在他的评论中,‘修改了’赫胥黎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被斯宾塞对进化论的信仰替代了。严复又把斯宾塞对进化论的盲目信仰与赫胥黎对高贵行为的呼吁混为一谈。严复通过这种‘修改’,达到了一种融合。他一直在寻求决定论和属于人类决断主义(determinationism)之间——一种融合和一种混乱而强烈的活力,尽管是不合逻辑的。”浦嘉珉:《鲁迅与进化论》(*Lu Xun and Evolution*),收在SUNY Series in Philosophy and Biology,奥尔巴尼—纽约: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7页。

政体模式所启发的现代国家,是否能在它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历史情境里生根呢?在这里,我们打算用一个同样适用于德国魏玛的阐述方式,事实上,当时共和党的反对者们都采用这种阐述方式。或者,我们可以追溯到更早,就是大革命之前和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里不存在所谓的中国特征。相反,这个反思对作家来说,意味着质问民主政体在欧洲的传统内部——这个民主政体建立的地方——的正当性。

(14) 在此课题上,这些文本聚集在一起,为了确认一个关于祛魅的事实:传统权力神圣光环消失后,随之而来的个体解放。相反,正如鲁迅、卡夫卡和布莱希特指出的,权力架构依照一种技术和经济专业知识的理性化,如卡夫卡小说中的“领导层”和鲁迅《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权力那样,其实并没有深刻地改变作为权力架构支柱的权力等级制度。因此,中国权力的民主化历史,似乎是一个祛魅的历史。^①它有一种双重觉悟:一方面权力并没有一个不可触碰的、超验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权力本质的披露也没有给予个体一个自我解放的政治方式。即便此书谈及的作品对重建这场历史演变有什么可能的意义保持开放态度,但这种关于民主化的观点,与光辉的历史宿命论所表现出来的狂喜(譬如19世纪欧洲作家,如雨果的作品中对历史进步的乐观情绪)截然不同。

三、异域情调和文化主义

我们仍然要面对一个困难:在欧洲文本里,我们应该将哪些部分

①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将这个术语定义为“魔法获救”。见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第134页。中文翻译请参见于晓、陈维钢等译:《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北京:生活·图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32页。韦伯借用了席勒(Schiller)的德文术语 Entzauberung。让-皮埃尔·高森(Jean-Pierre Grossein)《引言》,收于马克思·韦伯:《宗教社会学》,第128页。缪塞使用一个意义相近的法文术语 Désenchantement:“这就像对天地间一切事物的否认,人们可以把这叫作幻灭,或者假如你愿意也可以叫作绝望(désespérance);就像人类正在昏睡的状态中,而摸它脉搏的人却以为它是已经死去。”见《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第30页。中文翻译请参见梁均译:《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1页。

归类为“异域情调”呢？很多情况下，“异域情调”主导了它们的接受程度。我们指的不是那些无可避免地存在于某些读者和某些所指对象之间的距离（期待视野的问题），我们指的更多的是一种特殊的审美观，也可以称之为“东方主义”^①，其中，所指对象自己退隐至一种强烈的主观性之下，就如安德烈·布尔德（André Bourde）所定义的那样：

被异地吸引，对“别的东西”的需求，诗意的怀旧，争论的各种语言武器，令人惊叹的发现或被操控的品味，无聊浅薄的游戏或被篡改的神话，热情或官能，所有这些和他人的关系以及和其他事物的关系的不同面向……是欧洲人源远流长的意向之一。在欧洲人长久以来相信自己是世界中心的情况下，这是“流露”欧洲心理的一种方式。^②

因此，“异域情调”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偏爱若干秀丽而表面意象的文学品味，这些意象符合欧洲读者的期许。在这一前提下，即使《勒内·莱斯》的作者清楚地向它的读者表明，他意欲与“异域情调”这个“腐臭而滥用”^③的概念决裂，评论家却时常毫不犹豫地就把这本小说与《碑》中诗人的主观性追寻等同起来，认为他在中国寻找的仅是某种“自我内在”。

首先，我们要排除作家们对中国议题一无所知的揣测：谢阁兰是唯一一个亲身观察过辛亥革命的作家，卡夫卡从新闻和一本由尤利乌斯·迪特马尔（Julius Dittmar）^④撰写的、名为《在新中国》（*Im neuen China*）的书里，获得关于辛亥革命的资料。至于布莱希特，他一直对中国感兴趣，在哲学方面，《墨子》启发了他写出《墨翟》（*Me-Ti*）；

① 针对这些讨论，我们可以参考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艾田蒲（Etiemble）的《中国之欧洲》（*L'Europe chinoise*）。如欲参考异域情调的概念的概要综合，请看安德烈·布尔德的《异域情调的历史》（“*Histoire de l'exotisme*”）。

② 安德烈·布尔德：《异域情调的历史》，第598页。

③ 谢阁兰：《异域情调论》（*Essai sur l'exotisme*），巴黎：Le livre de Poche 出版社，Biblio essais 系列，1999年，第41页。

④ 请参见哈特穆特·宾德（Hartmut Binder）：《卡夫卡评论集》（*Kafka-Kommentar zu sämtlichen Erzählungen*），第218页。

《知识分子小说》[*Le Roman des Tuis*, 剧作《图兰朵》(*Turandot*)的灵感也源于这部小说]。^① 他对京剧及京剧的剧场美学深感兴趣: 1935年, 他在莫斯科观赏了梅兰芳的一场表演, 这成为他一篇重要文章的主题。^② 最后, 他对古代的政治戏剧也感兴趣, 其中一套元杂剧为他的《高加索灰阑记》(*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提供了故事素材。^③ 此外, 在谢阁兰的《勒内·莱斯》中, 叙述者由于太过痴迷于中国古玩和对东方女性的幻想, 以致懵然不知围绕着他四周的, 正是一场正在展开的政治革命。透过上述情节, 《勒内·莱斯》和其他作品一样, 对异域情调的陈腔滥调表达了明显的不信任。在《工作日志》的笔记里, 布莱希特明确地反对“一个乔装的、抽象的中国, 而且是充满漏洞的乔装”^④: 异域情调式的或隐喻化的中国(他称之为 *Chima*)的消失, 及中国如何转化成“工业郊区”, 这两个主题正是这套戏剧的中心。透过他们的题材选择——即“政治的转变”——及其处理, 这些作品转变为一场真实的反思, 反思中国的政治结构经过欧化后的未来。

“异域情调的目光”引起了一个关于接受的、更为普遍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中国作家里也能找到对应: 那就是中国的指涉对象(*réfèrent chinois*)在一系列以西方为中心的、关于政治现代性的话语中, 它的位置何在。某些评论甚至得出一种说法, 即在五四运动里, 中国被西方精

① 布莱希特看过汉学家佛尔克(Alfred Forke)在1922年翻译的《墨子》。他同时拥有老子《道德经》和《论语》的德文译本, 特别是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译本。在1925年的一篇关于老子的、名为《有礼的中国人》(*Die höflichen Chinesen*)的简短文章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读物的首次记载。《有礼的中国人》其后成为《老子〈道德经〉在流亡之路的起源传说》(*Legende von der Entstehung des Buches Taoteking auf dem Weg des Laotse in die Emigration*)。安东尼·泰特罗(Antony Tatlow)在布莱希特死后, 列出一张在其图书馆里找到的中文书单。见安东尼·泰特罗:《恶魔的面具》(*The Mask of Evil*), 第476—478页。

②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中国剧场艺术的评注》(“*Verfremdungseffekte in der chinesischen Schauspielkunst*”), 《布莱希特文集》(*Gesammelte Werke*), 第十六卷, 法兰克福: 苏尔坎普出版社, 1967年, 第619—631页。

③ 这里指的是李行道的《包待制智勘灰阑记》。这套元杂剧有一个法文译本。李行道著、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Stanislas Julien)译:《灰阑记》(*Hoei Lan Ki* 或 *l'histoire du cercle de craie*), 伦敦: 东方翻译基金, 1832年。这套杂剧曾被克拉邦德(Klabund)改编成德文版, 之后被佛尔克正式翻译成德文。

④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著、维尔纳·赫克特(Werner Hecht)编:《工作日志》(*Arbeitsjournal*), 法兰克福: 苏尔坎普出版社, 1973年, 第100页。

神殖民了,中国作家放弃了在文学中表达自己的文化。^①我们将在第一章里讨论这个议题。用“异域情调”的目光看中国的某一面(传统,甚至是落后的一面),这个问题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不断引起文学和政治的争论。中国作家被指控制造出了一个提供给西方读者的、关于中国的幻象。^② (16)

这种陈腔滥调的处理方式,我们称之为“异域情调”,或者更简单地称之为“文化主义”。再者,这种处理方式正好对应着欧洲民主政体及其植入中国的问题,而这是我们将要探讨的中心议题。中华帝国保有永恒不变的特征,臣服于一个循环而重复的王朝历史,这是自黑格尔^③以降于欧洲占主导位置的话语。在中国,这个话语也频繁地出现在鲁迅和其他具有现代思想的作家所批评的对象里。相反,此书尝试比较中国和欧洲作家的做法就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把鲁迅和属于他那一代的作家抽离出这个仅仅赞成现代化的、亲西方的、被假设为排斥中国文化的论争之中。后者通常会把鲁迅他们的作品简化为“感时忧国”的精神,以道德为本质,仅仅针对中国处境的作品,并拒绝把它们与“世界文学的普遍性作品”^④做任何比较。这也是我们选取的那些五四作家选择了虚构的方式,而不是中国经典形式的理由。事实上,虚构作品因其交际性的特征,包含了一个普遍的可能性:至少在理论上,一个虚构文本的所指对象一直是普遍的,即使是一个对作者所在的国家没有任何

① 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The Lure of Modernity: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特别是引言部分,第1—45页。中文翻译请参见何恬译:《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4页。

② 源自毛泽东以民族形式对抗五四世界性现代主义的坚持。这个讨论一直持续到今天,就如在国际电影节中获奖的中国电影所引起的争论一样,这些电影获奖后旋即被指控依循西方对中国陈腔滥调的想象,把中国表达成符合这些想象的样子。见张寅德:《后殖民理论对中国性的创造》(“Des théories postcoloniales à l'invention de la ‘sinité’”),《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世界》(*Le Monde romanesque chinois au XX^e siècle*),第69—86页。

③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1820)]里“东方世界”这部分,探讨过中国的问题。见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历史哲学》,巴黎:Vrin出版社,1998年,第93—108页。中文翻译请参见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13—136页。

④ 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99年(第三版),第534—536页。中文翻译请参见刘绍铭等译:《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7—358页。